

凝视与反凝视

——析《在高处》中的族裔主题

王淑芳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运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批判来分析李昌瑞的新作《在高处》中主要人物之间扭曲疏远的关系,以此展现隐匿其中的复杂的政治文化信念。通过质疑权威叙述者的叙事,揭示东方主义和白人男权至上论的危害,李昌瑞的作品展现了亚裔女性对社会权力话语和种族歧视的反叛。

关键词 后殖民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4-0065-04

古希腊神话里,代达罗斯乘着他创造出的人工翅膀在空中漫不经心地飞翔想必给亚裔美籍作家李昌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昌瑞在其著作《在高处》中创造了一个现代版的飞行父亲——杰尔·贝特。该书一出版就广受美国文学评论界的好评,被誉为亚裔美国文学的又一新作。

一、族裔性的主题

作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亚裔美国文学在近三四十年里备受美国主流文化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以前在美国学界一提代表性亚裔作家,必定要提汤婷婷和谭恩美,而近年来最受美国大众和各大学英文系青睐的则是黄哲伦和李昌瑞。李昌瑞生于1956年,3岁时随父母从韩国移民到美国,其亚裔美国人身份常常成为他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身份背景,少数裔族群文化如何融入主流文化也时常成为他小说的主题。1995年他的处女作小说《母语人士》不但成为当年美国的畅销小说,还荣获海明威基金会奖、美国图书奖等多项文学奖。李昌瑞也因此被《纽约客》杂志评选为40岁以下的20位美国优秀作家之一。

《在高处》的主要故事情节建构在小说主人公杰尔·贝特对他不开心的生活回忆之上。杰尔是个退休的意大利裔园林建筑商,他的生活总是充满了不开心的经历,年轻时娶了一韩裔妻子黛丝,可妻子“精神失常”,在游泳池溺水身亡;59岁时生活变得更加棘手,多年的情人要离他而去,年迈的父亲在疗养院的寂寞中憔悴;儿子将家族的产业折腾至破产;女儿又身患绝症。杰尔试图以他的单飞来摆脱这恼人的尘世,但

最终却意识到“无论你怎么试了又试,家庭的某些气流是你无法滑翔其上的。”^{[1] 298}最后他开始正视他复杂的生活,用一种全新的态度去拥抱那些曾被他的冷漠的人,不开心的感觉似乎也因此渐逝。

李昌瑞的处女作《说母语的人》和《姿态生活》都以韩裔移民作为叙述者,叙述凸显第一代和第二代亚洲移民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在高处》却一反前两部小说的风格,以白人杰尔·贝特充当小说的主要叙述者。美国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转变展示出大多数少数族裔作者的写作策略:作者以少数族裔族性迎合美国当今流行的多元文化政策,一旦声誉鹊起,他们即转入普世性的写作,向白人主流文化证明自己的创作实力不是仅靠族性来提升的。在此解释背景下,相当多的评论并未从族裔的角度来深入考察作者的写作策略。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或是该小说的风格与约翰·厄普代克的郊区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相似之处,或是“不开心”的人物塑造与美国文明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李昌瑞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和双重的亚美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作品中族裔问题所占有的比重。在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和东方主义批判来分析小说主人公杰尔的婚姻观和他短暂的婚姻史后,笔者认为,李昌瑞在小说中采用了反话语的策略来关怀美国少数族群,如何正确理解少数族裔仍然是该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二、东方主义与白人至上论

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杰尔、韩裔移民戴丝、波多黎各裔移民丽塔,再加上杰尔和戴丝意韩混血的第二

代《在高处》中主要人物以令人炫目的复杂的族裔背景冲击着读者,以其灿烂的族裔光芒牵引着读者探索这部作品的深奥主题,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以贝尔·胡克为代表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正是启开这探索之门的钥匙。自1978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问世以来,“东方主义”这一术语就广泛应用于文学和文化批评。赛义德指出,西方通过语言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艺术创作和性别想象的客观化,将东方想象成丰硕的女体,利用本身历史典范的发展、学科机制的逐渐扩充和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典范的自我验证,巩固了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建构。因此,“东方主义”基本上和西方如何自我合法化和征服他者有关。他还特别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大家普遍拥有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一致拥有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将此资料联结在一起的是一组相似的观念和一套有用的价值,这些观念对东方人的行为做出解释,它们为东方人提供心性、谱系和氛围”^{[2] 31-42},西方利用这些观念就能控制、重构和君临东方。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很多文学评论者重新解读美国主流文学中少数族裔被扭曲的形象,反思东方人物刻板化的形成之源,批判潜在的霸权政治意识形态。但由于以赛义德为首的主流后殖民研究对妇女和对社会性别的漠视,少数族裔作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常被评论家忽略。是后殖民女性主义促使了学术观点的转向。一些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根据赛义德的《东方主义》重新书写妇女的历史和性别问题,强调女性对殖民主义的反应有别于男性。这些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在促使学术观点转向的同时揭示了在殖民过程中性别、阶级、种族和性行为这些范畴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她们关注不同国家和不同背景下的妇女,探讨边缘化妇女的能动性、妇女的身体和国家话语。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提出的“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尤为引人注目。她指出,白人至上主义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赞美白人的肤色和白人由于拥有比其他种族更白的肤色而被赋予的统治权力。贝尔·胡克认为,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白人至上论紧密相连,白人男性对有色人种妇女的固定看法和相关行为体现了这一相关性^{[3] 37}。《在高处》主要人物关系的刻画,完整呈现了有关东方主义和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话语,揭示了边缘化少数族裔女性在东方主义和白人至上论话语下的艰难生存状况和斗争反抗。小说中意大利裔白人中产阶级杰尔和其父亲象征着西方,而作为杰尔欲望对象的韩裔妻子黛丝是西方有关东方的典型描述。杰尔对待妻子的态度鲜明地昭示了西方精神中的东方主义病理学的根基。西方男性对于东方的神秘感和性事的个人要

求,以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教导和控制东方的集体目标^{[4] 2}。

三、西方男性视角凝视下的东方女性

李昌瑞在《在高处》里着力将杰尔和其父亲塑造成男性主流文化的共谋者、东方主义的执行人。杰尔的东方主义思想早在年轻时的择偶倾向中就展现出来了。他对东方女子有强烈的猎奇感,患有白人男子的“西贡综合征”。他厌恶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少女的高大体格,偏爱亚洲女性的娇小体型。从心理分析批评来看,他对亚洲女性的钟情实际上是他俄狄浦斯情结的逆向表现。从他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既不英俊又不精明,在家庭中与其兄弟相比木讷笨拙,无法赢得父母的偏爱,在生意上他保守止步不前,没有多少建树,而他所从事的园林景观建设又总是让人把他联想成身份低微的蓝领工人。由于他的母亲(西方)令他感到压抑和焦虑,他不得不逃避到对东方的幻想中。他渴求绝对顺从的东方女性,期盼以东方女性的娇小衬托出他西方白种男子的强健威武,使他超越边缘、无助和可怜的境遇。在《在高处》中西方与东方的真正相遇,开始于一场购物的场景描写中。杰尔在百货公司偶遇正在推销香水的韩国留学生戴丝。戴丝未经杰尔同意就喷洒香水的行为引起了杰尔注意。杰尔看到戴丝独具东方轮廓的“完美的小手”^{[1] 108},听到“带有浓重韩国味的英语”^{[1] 108},瞧见她手持男性阴茎形状的香水瓶,他顿时觉得戴丝性感迷人、妩媚可爱。娇小的东方女性戴丝手持香水说着蹩脚的英语的形象,既迎合了杰尔西方白人男性的性优越,又夸大了西方文明的至上感,难怪杰尔对戴丝一见倾心难以自拔。

杰尔所青睐的理想化东方女性形象也引出了东方主义的另外一个特征——神话白人男性综合征。“被神话的白人男性是被深爱的导师,而最自然的教导对象就是尚未成熟的孩子。孩子给予导师无条件的爱,而这种爱又强化了导师的自大感。”^{[4] 12}杰尔和他父亲将戴丝称为“洋娃娃”无疑是在膨胀其自大感。戴丝无怨地“操持着家务、照顾着孩子、张罗着做饭,管理着那本该我们管,但我们又没管的交付账单的事务”,^{[1] 106}衬托出西方的“神”的高大,而东方只是西方指导下被动的、如孩子般的实体,可以被爱、被虐,可以被塑造、被管理。

文化批评家齐亚乌丁·萨达尔认为西方精神的性愉悦通常与东方的罪孽观念相联系,在天主教精神中,完美的生活是禁欲的,性通常带有罪孽和诱惑的暗示^{[4] 10}。于是,性扮演了东方主义宗教基础角色。西方凝视下的东方,充满了异国情调的、罪孽的、性的愉悦。杰尔的“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

孩^{[4]23}的东方妻子戴丝提供了所有的这些神奇。在杰尔的回忆里戴丝风情万种,欲望强烈,以至于杰尔认为戴丝“如果有一点能强过他(杰尔)的,只能是在性能力上^{[1]123}”。

权力是东方主义的一个根本因素。迷恋东方妇女的西方男子常常运用权力残酷惩罚他的迷恋对象。由于长期缺乏心灵交流,苦闷的戴丝只能通过采买和装潢来实现她的发现感和创造力。当杰尔发现戴丝的想法与自己的背道而驰时,他与父亲联合起来制裁戴丝。父亲告诫儿子:“你必须偶尔镇压她。是毫不留情地镇压。不然的话,像戴丝这样漂亮的女人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就会一天一天地更有主见了。如果她如你母亲,姿色和智力一般,你倒不用担心,你可以另寻他人。你懂我的意思吧?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台整洁如新又运转正常的车子的话,要整治它就只能是用工具堵住它的活塞,设法断掉它的燃料……我说你得凶残点。不必一直如此,偶尔为之。现在是良机。妇女解放运动把每个人都搞糊涂了。对她凶点,不要给她任何钱、任何关注、甚至任何抱怨和争吵的机会。把她关在家里一星期。然后在她倒下后给她买对耳环或买串珍珠,再带她出去吃一顿龙虾宴。之后,把她的主见全部弄掉。看,这样一切就恢复正常了。^{[1]11}

“毫不留情地镇压”、“整治”、“堵”、“断”、“凶残点”、“关”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对第三世界被殖民者实施的残暴手段乃如出一辙。杰尔遵照父亲的指令从经济上将戴丝关了起来,他只给戴丝“买诸如像牛奶、面包的主食的钱^{[1]112}”,命令她一如既往地做家务和照顾孩子。杰尔更用冷淡来惩罚戴丝,杰尔与戴丝平日交流本来就稀疏;镇压期间,他更是对戴丝不理不问。明知戴丝精神上苦痛不堪、失眠严重无法入睡,自私的他也找借口忽略掉自己的责任。“我本应去陪陪她,但那时我太想补觉了……我没起来,反身倒回了枕头……在孤独游弋的巨大黑天鹅忧伤的鸣叫声中进入了梦乡^{[1]123}”。弗洛伊德曾用“黑暗的大陆”比喻西方白人男性潜意识中的妇女形象,妇女与落后的第三世界殖民地与半殖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小说里的黑天鹅意象更加深了这一相似性色彩。在白人杰尔的眼里,不听从他安排的亚裔戴丝就如同音乐剧《天鹅湖》里邪恶、欺诈和仇恨的黑天鹅,该受到孤寂落寞的惩罚。这里,东方提供了施虐者无比的快感,而得到这种快感之关键在于施虐者给予受虐者痛苦的能力。杰尔所享受的恰是将戴丝视为一个奴隶,一个能残酷对待的奴隶,而且其对奴隶所实施的惩罚是不受责罚的,其职责被定义为羞辱性的^{[4]15}。东方主义对亚洲人民的剥削以及政治征服的合理化在此处得到了具体

的体现。

四、反凝视:发声”消解东方主义

奴隶是无权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但一旦奴隶反抗,声音就不可或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令白人男性的话语充斥整个故事的发展,极大地限制了少数族裔的话语。在杰尔对戴丝的叙述中,戴丝在很多状态下是无语的、沉默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认为发声是种族问题的关键,只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少数族裔才能思考、才能批判、才能在政治上有发言权。李昌瑞在亚裔美国人被白人主流文化边缘化了几个世纪后,急于为自己的同胞发声。为了突出少数族裔女性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抗争,他为戴丝设计了两种发声的方式:一是穿着上的发声,二是直接冲突性的发声。李昌瑞深知,在男性中心的父权社会里,女性根本没有自己的语言及主体,所谓女性主体,不过是男性论述按需要建构的客体(女性),是男性欲望凝视的投射。没人知道女性的真正本质,因此一开始就给她定义为男性绝对标准的对立面。为了符合男人的期望,女性被迫精心打扮,终日扮演纯真温柔之人。要重塑自己的主体,女性只有冲破男性为自己界定的标准。因此李昌瑞笔下的戴丝不愿自我欺骗,她不再扮演温柔,也不再用装束来迎合男性的欲望。她放弃了梳洗打扮,脱掉了芭比娃娃式的极端女性服装换上了实用的睡衣。当她发现此举还无法酣畅淋漓地表达她对以杰尔为代表的东方主义者的蔑视和反抗时,她更以裸体奔跑的方式呈现真实的女性自我。

对“神”的挑战会激起更加残酷的权力实施。当杰尔发现戴丝无视他白人男性至上的权威时,他认为戴丝精神失常,威胁要押戴丝去见医生。“医生”在女性主义有关“疯女人”的经典话语中扮演着制裁女性的男性话语权威。在女性主义先驱吉尔曼的《黄色壁纸》里,医生是压抑女性、逼疯女性的罪魁祸首。因此被激怒的戴丝大声嚷着“他们(医生)是彻头彻尾的大笨蛋^{[1]128}”,并手握小刀毫不退缩地向威胁她的杰尔刺过来。这一场面描写令我们联想到《黄色壁纸》中的结尾:“我”大笑着从晕死过去的丈夫身上爬过。李昌瑞这里无疑是将《黄色壁纸》中暗喻性的爬行替换成了斗争反抗。反抗彻底颠覆了东方主义者幻想中的温顺、忍辱负重的他者形象,反抗令东方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戴丝最终是以死实现了她最后的发声——在服用了安定后从泳池的跳板上跳入家里的游泳池自杀身亡。戴丝以自杀的方式终止了东方为西方提供施虐的快感。

戴丝的死无疑是少数族裔女性对抗东方主义思想和白人男性至上论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这个声

音并不孤独,在小说里更多的女性也发出了声音。杰尔的波多黎各裔情人丽塔发出了声音:为了自己的尊严与杰尔毅然分手,杰尔女儿发出了声音,她笑对死亡保全了她与亚裔未婚夫的孩子。少数族裔女性以妻子、情人、女儿的身份共同持续的发声消解了西方对东方的错误想象和构建。

五、结 语

一些研究者指出,美国是个殖民国家,美国的殖民性有效而鲜明地体现在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对比中。美国同英、法、德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区别,后者殖民的对象是一战前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而美国殖民的对象则是国内的少数族裔。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刚果等亚非国家的人民在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争取的是平等的人权,美国的少数族裔争取的是平等的公民权。自1774年建国以来,美国继承了前欧洲殖民国家的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坚信“白人至上”,在此基础上,美国很快就形成了自己以种族主义为主要特征,以移民、归化、排斥法律与国家政策为手段的殖民社会形态。在这种殖民社会形态里,东方主义毋庸置疑成了殖民的重要手段之一。

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以及统治政权通过权利知识的方式广为传播以东方主义和白人男性至上论等为主要特征的殖民思想,美国众多的少数族裔人民,特别是少数族裔女性深受其害。她们在生活中饱受歧视和压迫,在文学中丧失被再现的可能,在政治上革免发言权,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可喜的是,随着20

世纪70年代美国多元文化的兴起,许多少数族裔作家开始在文化上坚持了“对抗性”的实践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反话语”的对抗性写作。像华裔和欧裔混血作家水仙花常用白人读者所熟悉的“主流话语题材”讲述另一种不同的故事一般,李昌瑞在形式上遵从了西方男性主流作家的写作风格,采用传统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但在主题上他却用西方文学经典主题——“不开心的人”——来包装他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他笔下的杰尔的“不开心”是源于固守东方主义想象,他笔下戴丝的“不开心”是由于少数族裔特别是“自动的他者”^[5]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幌子下仍然受到心理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压迫。李昌瑞试图通过《在高处》敦促人们远离东方主义,看清那些被隐匿的事物;在被数世纪的近视想象所歪曲了的图像中,辨认出一种与之不同的概图^[4]。因此,为美国各族裔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找到一种新的基础正是该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参考文献:

[1] LEE C. Alo[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4.
[2] SAID E. Orientalism[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an Pall ,2000.
[3] HOOKS B. Killing race :ending racism[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4] 齐亚乌丁·萨达尔. 东方主义[M]. 马雪峰,苏敏,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5] TRINH T M. Woman ,native ,other[M].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上接第21页)

重温张闻天关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理论,对于端正目前的党风,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要始终不渝地贯彻群众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党员干部有必要结合实际,花大力气学习和掌握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原理,深刻领会和掌握群众路线这一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且学会运用群众路线,做到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深入群众,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老老实实在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的不满情绪有一定的渠道宣泄。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一定不要忘记,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永远不能变。其次,要制定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执政党的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制定一切政策,都要符

合而不是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制定政策的依据,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是检验政策是否正确标准。再次,要改革体制,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实行党政分工,健全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狠刹官僚主义歪风。这样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从人民群众中吸取不竭的力量,才能获得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1]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 张闻天文集 :三[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2]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 张闻天文集 :四[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3]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 张闻天文集 :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4] 《回忆张闻天》编辑组. 回忆张闻天[C].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5]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 张闻天文集 :一[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